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王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文号：04BYY045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翻译之定义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话语翻译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集中讨论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翻译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还包括希利斯·米勒、沃夫尔冈·伊瑟尔、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以及中国翻译家傅雷。

本书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论述翻译问题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于读者了解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有着直接的帮助。

本书读者对象:大学以上水平的专业研究人员、翻译实践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及外文学科的师生。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王宁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9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20831-0

I. 翻… II. 王…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277号

责任编辑:钱垂君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0×203 印 张:9

字 数:202千字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3247-01

丛书策划：宫 力 罗选民

主 编：罗选民

编 委：

Charles A. Laughlin [美]耶鲁大学

Perry Link [美]普林斯顿大学

隽雪艳 清华大学

李爽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刘树森 北京大学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王宏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谢少波 [加]卡尔格雷大学

张珮瑶 香港浸会大学

总序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新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要求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

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史料或语料翔实,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评审通过。我们期望这套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的发展而起到积极、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导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1
一、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学再建构	2
二、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9
三、走向一种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13
第一章 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角	21
一、翻译学的合法化	23
二、翻译的再界定和翻译学的建构	27
三、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再识	34
第二章 解构的文化转向：本雅明和德里达	43
一、本雅明：解构主义翻译的先驱者	44
二、德里达的介入和影响	55
三、巴别塔：翻译的不可译性	60
四、什么是“确当的”翻译？	68
第三章 解构与文化批判：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79
一、理论的翻译与变异	80
二、异化与归化的张力	90
三、翻译的显身和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104
第四章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	117
一、东方主义批判和理论的旅行	117
二、解构式的翻译与阐释	125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策略	133
四、模拟、混杂、第三空间与文化翻译的策略	143
第五章 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干预	155
一、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对峙还是对话？	156
二、勒弗菲尔：翻译与文学的操控	171
三、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等级秩序的颠覆	182
第六章 语符翻译与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	195
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	197
二、视觉文化和当代文化中的“图像转折”	206
三、图像的越界和解构的尝试	212
四、语符翻译与傅雷的跨文化语符翻译	217
五、超越文字的翻译和阐释	231
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翻译学的未来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73

导言：翻译的文化转向

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真正将翻译研究纳入跨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则至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事。在这方面，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所起到的开拓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① 这两位学者都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的，因此他们的翻译研究理论基点自然都是比较文学。而且与一般比较传统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关心文化研究的进展，并试图把狭隘的比较文学领地扩大到更为宽广的比较文化的范围。再加之这二人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 90 年代初来共

^①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有两个含义：广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 或 translation research)和狭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本章所讨论的翻译研究显然是后者。国际翻译理论界比较公认，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崛起之标志是于 1976 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位，还有比利时的约瑟·朗伯特、英国的特奥·赫曼斯和蒙娜·贝克(Mona Baker)、丹麦的凯·道勒拉普、美国的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

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1998)^①中提出了另一个全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这实际上对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他们在这方面并未能多作阐发,同时也由于他们自身知识的局限,也未能涉及跨越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理论课题。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随着翻译领地的扩大和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再加之文化研究的一度受挫,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本导言权且借用“翻译转向”的本意,将其沿用至中文的语境中来讨论,并将围绕翻译与文化以及这两个彼此互动的“转向”展开论述。

一、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学再建构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一直在向弱小的民族—国家渗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的人们为了实现与世界的交流和“接轨”,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学习英语。因而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如果他们都能直接用英语来进行彼此间的交流,将来还会需要翻译吗?翻译的功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将会自然消失吗?对

^① Cf.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情况果真如此,翻译的作用也没有削弱,而且在将来也不会削弱。与其相反的是,翻译已经在当前显示出而且仍将继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影响一样,它非但不可能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变得趋同,反而更加速了文化多元化走向的步伐,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便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和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丹麦学者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霍斯特·图尔克(Horst Turk)、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以及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安德烈·勒弗菲尔、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等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颇多著述,并且提出了不少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因此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往往称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的研究者群体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学派,至少不能算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共同纲领的学派,而是一种发展的趋向或潮流。围绕这一潮流和趋向,一批大体志同道合的学者在一起切磋讨论,因而无形中仿佛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研究群体。当然,介入这一大潮流的学者名单是不确定的,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圈外人”的兴趣,从而使得翻译研究的疆界也在大大地扩展。我们从这些来自圈外的学者的著述中很难见到以往的传统翻译研究学者所使用的那套术语,而是不断地见到一些

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新的术语。因而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翻译研究者不得不拍案而起,试图捍卫传统的翻译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这种善良的本意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信息时代,翻译本身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学科如果要保持旺盛的活力,就必须不断自我更新方法和理念,以适应变动不居的时代需要。这样看来,如果翻译研究仍像过去那样仅仅吸引少数专家注意,那它就永远摆脱不了“边缘化”的境地。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伪翻译”或“译述”或“改写”的东西也许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这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现在就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读者通过本书各章节的论述自然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诚然,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从一个跨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确实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同时也为我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进一步深入研究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但上述学者除去欧阳桢是出生在中国的汉学家而且精通中国语言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范例大都取自他们本土文化的语境,或者依赖翻译的中介,因而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当然,上述学者中有不少都曾对包括中国语言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有着一定的兴趣,有的甚至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学习中文,但事实是,即使对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也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努力的过程。尽管如此,与国际翻译学术界在近三十年内的发展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或停留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层面,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

跨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①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大大地加快了速度,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从事翻译研究或文化研究,没有中国文化的知识或中国语言的造诣至少是不全面的。鉴于目前所出现的翻译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拘泥于狭窄的语言字面的困境,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它一方面能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我们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通过这样的讨论和对话最终对从西方文化语境中抽象出的翻译理论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翻译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既然我们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②,因而我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就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如上

① 也许由于翻译学本身的地位,大多数翻译研究者用中文发表论文的阵地主要是《中国翻译》以及一些外语类的刊物。值得庆幸的是,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和《文艺研究》在内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性学术期刊近几年来也开始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了,但大都是广义的文化翻译方面的论文。

② 关于文化翻译方面的英文著述,可参阅 Wang N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所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伴随而来的就是翻译的定义也应该发生变化。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在这方面,我和许多东西方学术界的同行一直在呼吁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学的诞生和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下一章予以阐述,此处毋庸赘言。既然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便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和再现),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时更是如此。在这方面看来,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而他们将翻译看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也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铺平了道路。确实,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文化研究出现“危机”症状时,呼吁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局限,为呼唤一种真正的多元文化格局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诚然,作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者,我们首先应该立足中国的文化土壤,考察翻译对于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所起到的

重大作用。任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文化翻译在中国有着漫长而卓有成效的历史,它始自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对外来文化的大面积翻译和介绍,或者甚至更早。因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必然会想到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历史进程以及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或者说就是一部外国文学的翻译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被翻译成中文,使得汉语变得“欧化”和大大地不纯了。尽管我们从今天的“忠实”之角度完全可以对“五四”先驱者们许多在语言层面上显然是不忠实的、有些甚至从另一种语言转译的译著进行挑剔,但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些“翻译”文本所产生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当然,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语言的“欧化”和中国文学话语的“丧失”。平心而论,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这种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灵感的来源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①当然这番表述后来成了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则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翻译体的”、“混杂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体系,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由于它与其先辈的巨大差异和与西方文学的天然区别,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与西方的文化现代性进行对话,因而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神话,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他种”(alternative)现代性,或曰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诞生铺平了道路。^①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应该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进而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应当被看作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算作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尤其是涉及文学翻译就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transform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正是通过语言作为其主要媒介而实现的。

^① 关于有选择的“他种现代性”的具体论述,可参阅刘康(Liu Kang)“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Debate about Modernity in China”, in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eds.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4-188;最近的一篇有中译文的文章就是阿里夫·德里克的《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0-59页。

二、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和争鸣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①,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仍十分模糊,因此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以及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之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本导言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标志是成立于 1964 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但是若追溯其更早的渊源,则可从 F. R. 利维斯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现因子,也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②如果沿用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所描述的狭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之定义,那么翻译研究这一概念则起源于 1976 年的比利时鲁汶会议。这样看来,文化研究早于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较之翻译研究更为成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早期的翻译研究理论家呼吁一种“文化转向”就有着某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导向作用。实际上,这

^①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虽然不多,但可以参阅下列两种: Wang Ning,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uropean Review* 11. 2(May 2003): 183-191. Tao Dongfeng and Jin Yuanpu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5.

^② 关于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概况,参阅陆扬主编:《文化研究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